

智库言论

第 8 期
(总 532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8 年 3 月 15 日

抓住中日韩关系改善的机会“窗口” 实现中日韩经贸合作新的突破

2017 年以来，中日韩三国贸易走出了持续萎缩的阴霾，呈现出明显改善的迹象。新形势下，这种改善的势头能否得以巩固和持续？还存在哪些负面影响因素？突破口又在哪里？围绕这些问题，2018 年 3 月 6 日“新时代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趋向研究”课题组召开专家研讨会，来自中国社科院、外交学院、现代国际关系学院等知名专家发表见解，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政经良性互动促进中日韩关系改善出现机会“窗口”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变化是中日韩经贸关系的主要变量。近期，得益于中日韩高层释放出的改善意愿，中日韩经济关系出现明显改善。事实再次证明，中日韩经贸合作仍然是推动三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

（一）政治关系改善推动中日韩经贸关系回暖。外交学院副院长**江瑞平**认为，除受全球经贸回暖的影响外，中日、中韩政治关系回暖有力促进了中日韩经贸关系改善，将会对深化三国经济合作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经济总量远小于日本，但中韩贸易额接近中日贸易额，说明政治关系对经济合作影响较大。倘若不受萨德问题影响，近年中韩贸易额有望超过中日贸易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中日韩经贸合作出现新的变化特点，即跟政治外交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外交的色彩越来越重。

（二）经贸合作仍是中日韩关系“压舱石”。社科院日本所副所长**张季风**认为，随着中日韩经贸回暖，日韩对华贸易依存度有所上升，更加依赖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2017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超过750万人次，在日消费1.7万亿日元，拉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约0.2-0.3个百分点，到2020年预计将超过1000万人次，在日消费额超过2-2.5万亿日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认为，如同中美关系，经贸合作仍是中日韩关系的“压舱石”，但要发挥好积极作用，也必须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才能实现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

（三）经济实力此涨彼消强化了经济依存。**江瑞平**认为，中日政治互信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三十多年来，中日经济总量对比经历从1/8到3倍的此涨彼消。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强化了经济互利依存，中日韩三国经济上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认为，随

着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态势，中美欧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型经济体，而日韩将会成为中等的发达国家经济体，因此在经济上需要更加依赖大型经济体。不同量级经济体的具体功能合作将会成为新时代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中日韩三国在包括新技术、新经济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有助于形成区域性的新规则。

二、区域不稳定因素制约中日韩经贸关系改善

专家指出，中日韩经贸关系虽转暖，但还不稳固，随时面临历史领土纠葛、朝鲜半岛核危机、美国亚太政策干扰及逆全球化思潮的负面影响。

（一）中日韩之间政治安全脆弱性犹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沅生**认为，中日历来存在三大摩擦点：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现在中日关系有所改善，这三大问题得到控制，但会长期存在。目前来看，历史问题相对好一点，海上争端已由钓鱼岛争端扩大到包括防空识别区、国际水道等，而台湾问题随着蔡英文执政而变数增多。**江瑞平**认为，萨德问题恶化了中韩政治关系，造成两国经贸大幅下滑，且对双方民意影响较大。

（二）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威胁地区稳定。**李向阳**认为，朝鲜半岛局势相当微妙，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日坚持半岛无核化，而韩国则把南北统一摆在优先位置，甚至把朝核视为朝鲜民族的共同资产来看待，这种形势不利于中国东北吸引投资和实现振兴。**张沅生**认为，朝核问题当前出现缓和是暂时的，美朝都有意愿开展对话，但朝鲜希望以有核国家身份谈判，在这点上美朝还有分歧，因而不排除发生局部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

（三）美国因素是影响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干扰变量。李向阳认为，美国对华立场正在影响着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经格局。作为同盟，日韩两国是紧跟美国立场的，奉行战略优先，经济合作是第二位的，如韩国部署美国萨德系统，日本联美共推印太战略。江瑞平认为，美国因素的影响体现在区域格局的变化上，很长时期都是东南亚超前，东北亚滞后。美国因素对中日、中韩关系影响都是双重的，一重影响是日韩对华所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眼色，同时美国对华所做的事情也会波及到日韩本身。对待美国特朗普贸易保护政策上，中日韩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政治诉求。

（四）美欧主导的逆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江瑞平认为，到目前为止，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在美欧。美国特朗普保护主义和英国脱欧的民粹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显著，并将给中日韩经贸合作带来诸多挑战，但也会给三国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带来回旋余地。比如，日本抓住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机遇，引领推进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而且，日本现在已经腾出手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进程。

三、新时期中日韩经贸合作亟需寻找新的突破口

专家认为，眼下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升级，需要抓住全球环境变化的有利因素和中日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机会“窗口”，在加强政治安全领域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加快寻找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新突破口，在能源环境、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一带一路”建设等诸多

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一）抓住关键时点全方位恢复中日韩三国对话渠道。张沅生认为，中日韩三国应抓住政经全面回暖的重要机遇以及 201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2019 年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2020 年东京奥运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2023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推动中日韩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沟通对话机制，包括加快恢复中日韩领导人峰会、高层经济对话、安全或防卫对话、海空联络机制等，同时充分意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俱损，避免贸易战，对于涉及共同利益的合作与对话，不要轻易停掉，对话渠道不要断，对于分歧摩擦，该斗就斗，如涉海争端，但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不走向军事冲突，不要破局。

（二）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李向阳、张季风建议将“一带一路”建设更多以周边为主，可以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如将中日韩合作纳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将东北亚地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江瑞平建议，在政府引导下，加快推进中日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第三方或第四方市场合作，包括引导三国企业共同开发非洲市场。张沅生建议，中日韩合作应着力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可考虑开展“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对接研究，跳出竞争激烈或争议较大的地区，探讨中日韩在非洲等地区开展优势产业合作。陈凤英建议，只要在经济上互利，可以推动“一带一路”与“印太战略”的对接合作。

（三）积极寻找互补性强的新兴产业合作的突破口。张季风建议，可优先选择受政治影响小一点、可行性大一点且符合三国共同

利益的行业领域开展合作，包括能源、环保、养老、旅游等有关产业。**陈凤英**建议，中日韩三国都是能源消费大国，日韩能源基本靠进口，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达 70%左右，三国应联合起来争取亚洲能源定价权；中日韩三国可在推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合作，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共享经济等领域开展新的合作，三国还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如扩大人民币与日元、韩元的互换规模和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中的本币结算规模。

（四）充分发挥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积极作用。江瑞平认为，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起步较晚，但 2011 年在韩国首尔设立了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意味着中日韩合作是具有内生动力的，因此可充分发挥三国合作秘书处在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和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围绕三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深入开展合作研究，引导中日韩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中日韩经济发展合作趋向”课题组 刘向东 逯新红整理）